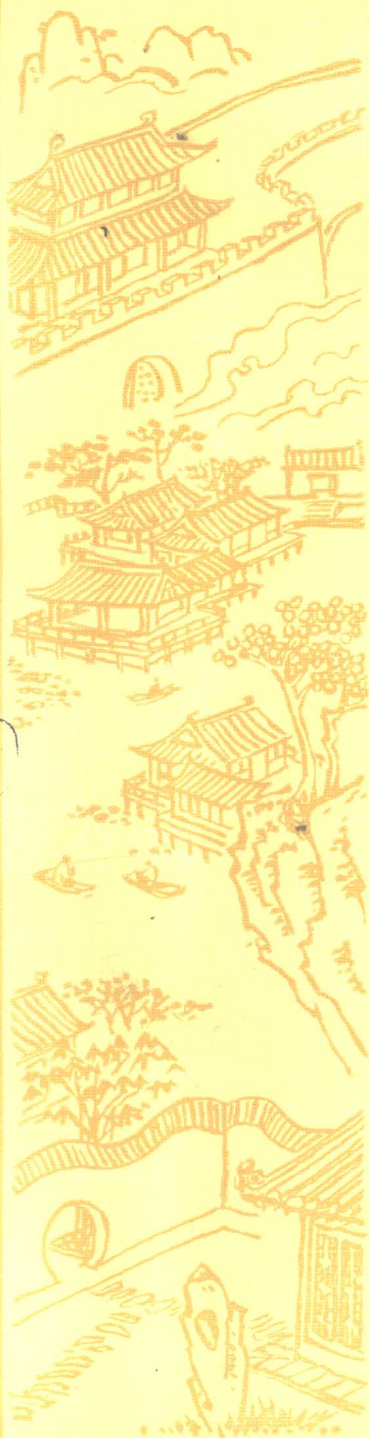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代游記選

(上)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

中国古代游记选

上

倪其心 费振刚 胡双宝

顾国瑞 王春茂

选 注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前 言

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过程中，独立的完整的游记散文是比较晚出的。

先秦两汉是我国古代散文发达、成就辉煌的时代。先秦诸子、两汉政论和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史传，都有许多优秀的典范的散文作品。但是，这个时代并没有留下可以称为“游记散文”的作品。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小品文字：

“又西六十里：曰太华之山，削成而四方，其高五千仞，其广十里，鸟兽莫居。有蛇焉，名曰‘肥螭’，六足四翼，见则天下大旱。”

——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

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
——《论语·先进》

前者大概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描述西岳华山的文字，虽然它有着神话的色采。后者可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抒写春游的精采片段，虽然它是孔子的学生曾皙的一种志趣。也许可以把它们剪裁出来成为一则山水小品，视为古代

游记散文的某种萌芽状态的作品。但它们毕竟不是独立的，完整的。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生动的描述：

“到天关，自以已至也。问道中人，言尚十余里。其道旁山胁大者广八九尺，狭者五六尺。仰视岩石，松树郁郁苍苍，若在云中。俯视溪谷，碌碌不可见丈尺。遂至天门之下。仰视天门，窅辽如从穴中视天窗矣，直上七里。赖其羊肠逶迤，名曰环道，往往有绳索可得而登也。两从者扶掖，前人相牵。后人见前人履底，前人见后人顶，如画重累人矣，所谓磨胸捏石扞天之难也。……”

——东汉马第伯《封禅仪记》

这大概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记述攀登东岳泰山的文字，但却不是独立的完整的游记散文，而是记录皇帝登泰山祭天礼仪的著述中的一节。诸如此类，在先秦两汉的散文著作中还可以列举。这种现象表明，先秦两汉没有游记散文，但这并非当时作者没有写作这类散文的能力，而是由于他们不写这类作品。

从先秦到两汉，人们对大自然山水的认识具有两重性。一方面，九州山水是人类生活的物质资源，具有社会经济作用，十分重视，因此产生了《尚书·禹贡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这类重要的地理文献著作。另一方面，在人们的思想上、精神上，大自然山水是神祇的化身、君子的寄托，是思想统治、道德教化的象征物，具有超经济的约束作用。众所周知，在远古时代，日月山川都是神。到唐尧、虞舜、夏、商、周代，九州的名山六川、五岳

四渎，都是天帝神祇的所在。新年开岁，帝王既祭上帝，便“望于山川，遍于群神”（《尚书·舜典》）。此外还有巡视四方，登五岳，祭五帝的仪礼制度。相沿而到秦皇汉武，都曾登泰山，行封禅，祭祀天地神祇。正由于山水自然的神化，产生了《山海经》这样神怪而荒诞的山川记述，也留下了《封禅仪记》这种登山探路的工作记录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在百家争鸣的活跃的思想探索中，大自然山水渐渐人化，变成了文质彬彬的仁人君子品德的寄托。孔子说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有一次，“孔子观于东流之水”。他的学生子贡问他：“君子之所见大水必观焉者，是何？”孔子说：“夫水大，遍于诸生而无为也，似德；其流也埤下，裾拘必循其理，似义；其洸洸乎不涸尽，似道；若有决行之，其应侯若声响，其赴百仞之谷不惧，似勇；主量必平，似法；盈不求概，似正；淖约微达，似察；以出以入，以就鲜絜，似善化；其万折也必东，似志。是故君子见大水，必观焉。”（《荀子·宥坐》）大自然的流水在孔子的心目中，具备君子一切美好的品德。因此，当他的学生曾皙表示自己的志趣，乐于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他便欣然赞同，誉为知礼。这样，在先秦时代，大自然山水虽然由神祇而为君子，却始终保持着神秘的、尊严的、崇高的品格特性，令人敬畏爱慕，而不视为游乐的对象，不描摹山水的自然形态。因而不仅散文中没有山水游记，而且《诗经》也只有用作比兴的山

水诗句，没有山水诗。

但是，在战国末到两汉的诗歌辞赋的创作里，有山水的形象的描绘。在屈原的《九歌》中，山水自然被赋以神奇美妙的形象，用来渲染烘托诗中主人公的抒情形象。宋玉《高唐神女赋》中的巫山神女，便是巫山云雨的幻丽迷人的形象。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里的阴森可怖的山中节物描绘，更是用作招唤公子归来的反面手段。而枚乘《七发》中“曲江观涛”的描述，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中铺张的地理物产的形容，也都显示着山水自然进入了文学创作。但是，在这时期的散文作品中，以山水自然为抒情手段或描写对象的文字，仍然罕见。这种现象显然表明，在先秦两汉的文化观念里，诗歌韵文与散文的功用不同，有着相应的分工。这就是，以《诗经》为经典代表的诗歌韵文，主要用于述志抒情，与音乐舞蹈相结合，属于今天所谓文学艺术范畴。以《尚书》为经典代表的散文，主要用于记事论理，只用语言文字作手段，属于今天所谓社会科学范畴。因此，在汉代人的观念里，《楚辞》是《诗经》的变体，汉赋是《诗经》的支流，而先秦诸子、历史传记、两汉政论等散文著述，都归源于《尚书》。简截地说，诗歌韵文属于语言艺术，散文则属于应用文章。由此可见，先秦两汉作者不写游记散文，既有社会思想的原因，更有文学观念的原因。

从汉末建安时期开始，到魏晋南北朝，相当完整的骈文游记出现了，但是独立的完整的散文游记却仍未出

现。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观念和文学语言的发展上。这是一个诗赋骈文兴盛的时代，散文显得格外沉寂。

在这个时代，随着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变动，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动摇，异端思想源源而出，老庄思想格外活跃，大自然山水在人们思想上精神上所具有的那种神秘、尊严、崇高的品格特性和那种统治、教化的象征物的约束作用，也渐渐削弱而至于消失。高于人们之上的大自然山水，渐渐变成人们憩息的场所，游赏的对象，抒情的凭借，吟咏的题材，并且日益成为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的一种表现方式，日益具有阶级社会的具体人物的性格面貌。在建安时期，我们看到了古代较早较完整的一首山水诗，就是曹操的《步出夏门行·观沧海》，大海的气势表现着曹操自己的胸襟，大海具有这位叱咤风云、吞吐日月的一代豪杰的性格特征。还可以看到王粲的《登楼赋》，湖北江南的风物景象，触发这位中原有志青年的一腔慷慨，山水平原是他的抒情手段，表现着志士不遇的情怀。在魏晋之际，可以看到嵇康诗歌里那种领略山水乐趣的自得情景：“流磻平皋，垂纶长川。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。”（《赠秀才入军》之十四）也可以看到赵至骈文里那种悲愤不遇、山川凄怆的失志情景：“寻历曲阻，则沈思纾结；乘高远眺，则山川悠隔。或乃回狂厉，白日寝光；崎岖交错，陵阻相望。徘徊九皋之内，慷慨重阜之颠，进无所依，退无所据。”（《与嵇茂齐书》）山水自然随着人们的遭际境遇而变

化着它们的精神面貌。显然，从人们接受大自然山水的思想统治、精神教化，变为人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感情来认识、领略大自然山水，反过来使大自然山水具有相应的精神面貌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。事实上，从汉末建安时期到魏晋之际，在诗赋中已经相当多地写作山水自然题材。换句话说，作为山水游记的内容，虽然还没有以散文形式表现出来，但是在诗赋创作中已经有了相当的表现。

两晋从一统天下到苟安江东，门阀统治巩固，政治混乱，玄谈风行，名士优游岁月，恣情山水。寒门庶族压抑不平，清高不苟，隐逸山林。于是山水自然既披名士风流，又有隐士品格。一方面在门阀文士诗赋中充斥玄理说教的苍白文字；同时也听到了“振衣千仞冈，濯足万里流”（左思《咏史》之五）、“山水有清音，何必丝与竹”（左思《招隐》）的寒士不平，山水成为对抗门阀的一种依据和标志。而木华《海赋》和郭璞《江赋》更使长江大海得到气势壮阔、形象瑰丽的表现，充分显示着大自然山水成为歌咏的主题。到东晋，玄谈和佛理结合，名士和高僧合流，山水和寺庙一体，自然和空门同归。于是我们看到了庐山诸道人《石门诗序》那样富有玄佛气味、结构相当完整的骈文游记，还可以看到著名玄言文学家孙绰自诩为“掷地作金石声”的《游天台山赋》。前者是亲临其地的实游，后者是观图神往的卧游。这一实一虚，一序一赋，显然不属散文游记。但是，如果从主题和结构来

看，它们实质上是“游记”作品。这就是说，山水主题的文学创作，辞赋骈文的游记作品，在东晋已经正式出现，虽然它们蒙着玄佛的迷雾，带着格律的束缚，山水自然的形象显得苍白。但是，产生的条件既经具备，山水主题的文学创作便蓬勃发展起来。

南朝四代，政治上寒庶地主有所抬头，门阀统治开始衰落；文学上“有文有笔，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”（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），诗赋骈文兴盛。由于这两方面原故，使诗赋骈文作品的山水主题空前活跃。王谢大家因为政治上受到打击而愤愤遨游山水，于是“庄老告退，山水方滋”（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），我们看到了谢灵运大量创作山水诗，开拓了诗歌史上一片新的领域。寒门庶族急切要求政治上改变压抑地位，于是“饥鹰独出，奇矫无前”（敖陶孙《诗评》），我们看到了鲍照的《芜城赋》、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这样的山水辞赋骈文。而当晋、宋易代的政治动荡渐趋平静，新、旧门阀习惯于频繁而混乱的政变，仍旧安于半壁江山的苟安，于是隐士和寒士在山水骈文中突出了起来，我们看到了“山中宰相”陶宏景的《答谢中书书》和失志俊才吴均的《与宋元思书》。除了诗歌辞赋，南朝山水骈文以书信的形式为多，成就也最为突出。不论长篇巨制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，还是短小精致的《答谢中书书》、《与宋元思书》，作者们都在描述山水中熔铸着自己人生仕途中的体验，表现独特的个性和风格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侧面。它们的手法、技巧也都

汲取了诗歌辞赋的艺术经验。实质上，这些都是书信体的骈文“游记”。可见从南朝人的文学观念看，“游记”已经涌现。只是今天称为“游记”的散文作品则尚未独立出现。

魏、晋以后，属于学术性质的地理著述除记载山川物产外，多述人物古迹、风土习俗，其中颇多生动描述，文笔优美。这类著述不属文学，所以都用散文。可惜南朝这类著述都已散佚。从残存片段，可见其一斑。例如《水经注》引述的下述两则：

“江水又东迳西陵峡。《宜都记》曰，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，至峡口百许里。山水纡曲，而两岸高山重嶂，非日中夜半，不见日月。绝壁或千许丈。其石彩色形容，多所象类。林木高茂，略尽冬春。猿鸣至清，山谷传响，冷冷不绝。所谓三峡，此其一也。”

——《江水注》

“浦阳江又东北迳始宁县嵎山之成功峤。峤壁立临江，欹路峻狭，不得并行。行者牵木稍进，不敢俯视。峤西有山，孤峰特上，飞禽罕至。尝有采药者，沿山见通溪，寻上于山顶。树下有十二方石，地甚光洁。还复更寻，遂迷前路，言诸仙之所憩宴，故以‘坛宴’名山。峤北有嵎浦。浦口有庙，庙甚灵验。行人及樵伐者，皆先敬焉。若相侵窃，必为蛇虎所伤。北则嵎山与嵎山接。二山虽曰异县，而峰岭相连。其间倾涧怀烟，泉溪引雾，吹哇风馨，触岫延赏。是以王元琳谓之‘神明境’。事备谢康乐《山居记》。”

郢道元谓《宜都记》为西晋袁山松所著（按，《新唐书·文艺志》载录为李氏《宜都山川记》）。“谢康乐”即谓山水诗人谢灵运，其《山居记》已佚。这类文字虽可视作游记小品，而在当时却是应用文字。这种现象又可在其它应用文字中看到。例如谢灵运有《山居赋》，并自己作注加以说明，而其注文也有近似游记的片段。试读下引一段：

“南山，是开创卜居之处也。从江楼步路，跨越山岭，绵亘田野；或升或降，当三里许。途路所经见也，则乔木茂竹，缘岵弥阜，横波疎石，侧道飞流，以为寓目之美观。及至所居之处，自西山开道，迄于东山，二里有余。南悉连岭叠障，青翠相接，云霄烟路，殆无倪际。从迳入谷，凡有三口，……。缘路初入，行于竹迳，半路阔，以竹渠涧。既入，东南傍山渠展转，幽奇异处，同美路北。东西路因山为障。正北狭处，践湖为池。南山相对，皆有崖岩。东北枕壑，下则清川如境，倾柯盘石，被隩映渚。西岩常林，去潭可二十丈许。葺基构宇，在岩林之中。水卫石阶，开窗对山；仰眺层峰，俯镜浚壑。去岩半岭，复得一楼。回望周眺，既得远趣；还顾西馆，望对窗户。缘崖下者，密竹蒙迳，从北直南，悉是竹园，东西百丈，南北百五十五丈。北倚近峰，南眺远岭，四山周回，溪涧交过。水石林竹之美，岩岫隈曲之好，备尽之矣。”

记叙浙东山林庄园的建筑，写景优美，情趣盎然。它虽是注释文字，而骈散间杂，清丽可玩。谢灵运又有《游

名山志》(今佚)，则纯属散文，其残文如：

“破石溪南二百余里，又有石帆。修广与破石等度，质色亦同。传云，古有人以破石之半为石帆，故名彼为‘石帆’，此名‘破石’。”

比较起来，它的应用文字性质更为明显。上述情况也可表明，两晋南朝虽然已成熟地涌现出骈文“游记”，但散文中却没有独立的完整的游记作品，主要原因已非社会思想上的山水自然观的作用，而是由于文学观念上不以散文为文学艺术，不认为散文语言是文学语言。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，北朝的两种散文巨著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和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其中许多记述山水名胜、风土人情的精采篇章，历来读作游记散文，实则都不是文学作品，而是地理人文的专著。当然，应当看到南北朝上述地理著述中许多富有文学价值的片段，对于后来游记散文的成熟出现，也是肥沃的艺术土壤，提供了艺术滋养，其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。

总之，魏晋南北朝中，山水自然已渐渐失去对人们的思想约束作用，正如谢灵运所说：“夫衣食，人生之所资；山水，性分之所适。”(《游名山志序》)山水自然只是人们按照自己性情兴趣来游赏憩息的对象和环境，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抒情述志的手段和方式。而由于当时的文学观念，因而艺术地表现山水主题，主要用诗赋骈文，不用散文。这就是说，独立的、完整的游记散文作品的产生，关键在于文学观念、文学语言上的一种转变，就

是需要以散文取代骈文的文风改革。

隋代到唐玄宗开元盛世，文风大体沿袭南朝，仍旧盛行骈文。一方面在山水宴游中，文人士大夫往往以咏诗为主，用骈文作序以说明宴游时地及感慨，其名篇如初唐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；在书信中，以山水主题来寄慨述意，仍不乏佳作，其名篇如盛唐王维的《山中与秀才裴迪书》。另一方面，在应用的专著中，仍可读到精采的山水记述片段，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即是用散文记述西行求经的旅途经历观感，颇有具体生动的描写。这种情况显然与南北朝一脉相承。到唐玄宗天宝年间，由于政治日趋腐败，从封建阶级下层渐渐出现一股以复古求改革的思潮，思想上要求遵循儒家思想传统，文学上主张运用“古文”，即以先秦诸子为典范的散文和散文语言。在天宝末，安禄山叛乱暴发以后，由于战乱现实表明政治改革的亟须，因而这一复古思潮的影响渐渐扩大。到唐肃宗、代宗朝，这一思潮的代表作家之一元结，用古文即散文写作了许多山水主题的铭文题记，实际上已开游记散文的先河。因而他在文学史上既是“古文运动”的先驱者，又是游记散文的始作者。元结的游记散文，一方面显示着文风的改革，同时又表现出过渡的痕迹。从内容看，他的游记散文大都是借山水以抒感慨，以发议论，具有较高的现实性和政治性，是从改革出发的。例如《右溪记》记叙发现、兴修道州城西附近一条无名小溪，而主题思想则在议论朝廷用人不当，感慨名位和才用不

符。文中明确写道：“此溪若在山野，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。处在人间，可为都邑之胜境，静者之林亭。而置州以来，无人赏爱。徘徊溪上，为之怅然。”所以前人评论其文，“大约抗节励志，不可规随。读其书，可以想见其人”（章学诚《元次山集书后》）。从形式看，他的游记散文大多为铭序，以四言韵文的铭为主，小序为说明作铭情由，所以十分精短，但也表明这类游记散文其实尚未完全独立，不免拘于传统文学观念和习惯。

完整的游记散文的独立出现，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，是韩愈、柳宗元“古文运动”的一项成果。安、史乱后，大唐帝国从鼎盛转向衰落，封建制度也从颠峰走向下坡。宦官擅权，军阀割据，东北为安、史余党控制，西北吐蕃、回纥势力强大。朝政混乱，姑息妥协。到唐德宗贞元年间，朝野改革要求强烈。这种政治形势下，韩愈以复古求改革的“古文运动”应运而生。他努力复兴儒学，鼓吹道统，排斥老庄思想、道教、佛教的异端，提倡以先秦两汉散文为典范的“古文”，反对讲究声韵对偶、堆砌词藻典故的骈文，从思想上文化上为巩固大唐统一、维护封建统治而谋求改革。柳宗元则注重实际的政治改革，积极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激进的改革斗争。他与韩愈的政见并不一致，但根本目的相同。因此在改革失败，遭遇挫折之后，他也用古文从事著述和写作。在倡导古文、反对骈文上，他与韩愈一起作出重大贡献。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出新的书面散文语

言，用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，取代了日趋僵化的骈文语言和空洞浮华的骈文作品，从而使散文从应用范围进入文学领域，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，解决了关键的散文的文学语言问题。正是在这样的改革思潮的浪涛中，独立的完整的游记散文的涌现，恰同六朝游记骈文的出现形成对照，带着改革的生气，冲破骈文的束缚，山水自然的形象显得充实有力。这是时代的使然，因而也有鲜明的时代特点。

爱国壮志的追求和遭际不遇的悲慨，是这时涌现的游记散文在思想内容上的共同特点。作者们多为谋求改革的志士，又多遭挫折，因而他们的游记散文多属谪迁宦游的产物。韩愈很少游记散文，而其《燕喜亭记》为早年贬官阳山时的作品，《记宜城驿》为晚年谪迁潮州途中的产物。前者写替友人筑亭取名的事由，以寄不遇感慨，以励志节操守。后者叙述宜城驿、楚昭王庙的沿革和习俗，抒发国家衰落、军阀割据的悲慨。大诗人白居易在元和以后也颇有游记作品。其《草堂记》作于贬官江州司马期间，以正面记叙筑室庐山、归隐山林的志趣，反衬厌恶混乱政治于言外。《三游洞序》是在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途中产物，记述作者兄弟巧遇元稹，同游三游洞的过程，借这一胜境处于交通要道而长期不为人知的遭际，抒泄怀才不遇的感慨。而最足以代表这时期游记散文成就的作家，是柳宗元。

柳宗元的游记散文都是在元和间贬谪永州、柳州的

十四年中写作的，具有高度的思想性、现实性和政治性，鲜明表现出他身处逆境而壮怀不懈的爱国志士的思想性格，形成雄健雅深的独特风格。而在艺术上则继承发展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，熔会诗歌的比兴、史笔的褒贬、寓言的讽谕、政论的犀利，又汲取辞赋骈文描写山水的艺术经验，使游记散文的文学价值空前提高，奇葩盛开，芳馨永播。他的《愚溪诗序》记叙构筑冉溪宅园和以“愚”命名的情由，原是说明写作《八愚诗》的序文，因而有诗序的一般结构，但精心构思，精当剪裁，取法寓言，抒泄孤愤，讥刺世俗，确为山水主题散文中别开生面之作。《游黄溪记》允称完整的游记作品，写景如绘，状貌可见，清丽省净，而叙述传闻，议论隐沦，委婉深微。最代表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成就和特点的是“永州八记”。首篇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其实总结了两种游玩山水的态度和体会，生动而深刻地说明在身处逆境时应当坚持崇高理想，胸怀开阔，目光远大，从思想上解除挫折忧烦的束缚，不应生活闲散，逃避现实，追求一时的自我麻醉。它有浓厚的抒情性、高度的哲理性和美妙的象征性。《钴鉤潭西小丘记》在记叙小丘的遭际中，寄托了下层才俊的压抑愤懑。它赋小丘以生气勃发的形象，用史笔写小丘弃置不遇的境况，以拟人的诗情写小丘购得致用的惬意，发明快的议论来阐述小丘前后遭际的政治涵义。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是小品游记的杰作。在幽隔澄净的小石潭景物描写中，显示出坦荡磊落的清高君子

的胸襟情怀；而在探望源头的回顾中，寄托着志士仁者离群索居的凄怆感慨；作者终于“以其境过清，不可久留”，离开了小石潭，正意味着作者的志士胸怀，在进取和退隐的抉择中，不能超脱现实，不甘清高隐逸。总之，柳宗元山水游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开创了游记散文以山水抒写政治感怀的一种优良传统，影响深远，直至于今。他的“永州八记”已经完全不附属于诗赋韵文，表明游记散文作为文学作品而独立发展起来。因此，在古代游记散文的发展过程中，柳宗元“永州八记”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。

从元结到柳宗元，是古代游记散文独立开创的阶段。如果从今天称为“游记”的观点看，事实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山水为主题的题记散文，是作者们各自仕途宦游中观赞山水、凭吊古迹以及修筑园林，兴办德政的各种题名作记文章。因此，在这一时期，既可看到散文游记，也可看到骈文游记，其名篇如韩愈的同榜及第的朋友冯宿的《兰谿县灵隐寺东峰新亭记》，便是游东峰亭，赞亭主，美德政的题记骈文。同时还可看到游记散文相当活跃，形式上也有所创造。例如韩愈的门生李翱的《来南录》，便是古代最早的一个旅游日记，简略而不无描述地记录了从今陕西西安市到今广东广州市的旅行，行程长达数千里，经过今陕西、河南、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广西六省，历时半年。它有实录地理著述的文献价值，也有相当文学价值，开创了古代游记散文的一种体裁，